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汪精卫政权 > 论文

试析（1933—1935年）中日关系的缓和

发布时间: 2010-03-07 点击次数: 293 作者: 杜欣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新一轮的抗日高潮。但在1933—1935年，中日关系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34年中日之间没有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日本推行广田和谐外交，中国方面也限制排日运动，通过谈判实现了与“满洲国”通车通邮，长城沿线设置税关，开发华北产业等问题，双方的外交级别也升格为大使级。本文旨在通过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和中国政府三条线索分析这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缓和的原因。

关键词：1933—1935年中日关系 缓和 三条线索

1933—1935年，中日之间出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少有的寂静，不仅在军事上两国没有冲突，而且在外交上两国开始达成一系列的缓和，除了“天羽声明”的插曲以外，两国的关系甚至有了短暂的升温，国民政府对“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两国公使馆升级为大使级。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日本二元外交的特点，梳理出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和国民政府三条线索，综合考察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如何产生了20世纪30年代中日之间少有的平静状态。

一、日本外务省的亲善外交的开展

1933年9月14日，广田弘毅接替内田康哉出任外相，主张改善日本由于退出国联而日益孤立的国际地位，并主张排除军部对外交的干预，实现由外务省统一的外交一元化。这就是广田“和谐外交”。斋藤内阁的五相会议确定了日本退出国联后的外交政策大纲，即促进日本与“满洲国”关系的发展，并通过外交的手段改善与中美苏的关系。由此，军部的强硬派得以被暂时抑制，外交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这时日本政府也有实施对华缓和的外部环境。1933年8月，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表示逐步解决中日悬案，日本政府和军部认为国民政府的亲日政策是一时的敷衍，但是日本外务省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扩大日本的经济利益。

广田的和谐外交不能看作是币原协调外交的继续，而是日本退出国联后的对列强的协调外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因而孤立于国际社会，所以广田提出改善日本与中美苏关系。除此以外，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展经济外交，实施倾销策略，也使得被倾销国家开始抵制日本，日本的国际处境变得艰难。这样的大环境促使日本产生了推行和谐外交的动力。但是日本政府的所谓“和谐”，并非真正对中国实行和平亲善政策。五相会议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在开头就明确提出要“使中国成为以日本为中心，日、满、华三国友好合作，确保东亚和平的帝国方针的追随者”，[1] P22—24基本宗旨为“在中国扩张我国的经济权益”。不仅目的明确，而且方法明确，要“逐步追求以期达到上述目的”，主张诱导中国政局自然转化，使其有利于日本。其制定的“和谐”方案中也有强硬策略，其中记有“在我方不主动谋求友好，而中国方面又侵害我方权益时，则我方应按自己立场采取必要措施，以严肃公正态度对之”。[1] P22—24该方策

认为“影响中日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基于远交近攻心理的诸般行动及外国为此而给予的援助”，[1] P22—24主张“力加排斥”，其实是担心中国利用外援强化自身力量，不利于日本的侵略的进行，其中也包藏着挑动国民政府各派的不合，便于其从中渔利的祸心。1935年时，中日亲善开始走上正轨。在得到国民政府“不抵制日货，抵制反日朝鲜人，同日本合作”的保证后，广田外相开始高调宣传中日亲善，蒋介石和汪精卫也发表声明配合这一声明。但是日本政府只是在观察国民政府的动向，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倒是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中日缓和的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主动的姿态。由于军部中的鹰派一直主张对华强硬，而且其影响不断加大，日本的二元外交特征也愈加明显，后来的“广田三原则”即体现了军部强硬派的影响。总体来看，广田的温和并不温和，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手法和策略，温和只是一个幌子，不过是日本政府为摆脱国际上孤立地位的一个措施。所谓的对华亲善也是其措施中的一个步骤，“天羽声明”展示了日本实际的想法，有吉明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是按“天羽声明”的方针进行的。但是也应该肯定广田和谐外交积极的一面，它毕竟为国民政府同日本提供了一个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平台，为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

二、日本军部武力行动的中止

日本军部一直势力很大，不受政府节制，而且军部存在着“下克上”的传统，在日本外交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塘沽停战协定》这么重要的两国间的文件，不是外交部主导的，而是由在外的军队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军队对中国政策拥有相当大的主导权。军部力量，尤其是陆军，对国民政府的对日亲善政策表示怀疑，认为是国民政府的“欺骗”，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在日本军内存在着日本作为东亚盟主必与英美一战的观念和“1935—1936年危机”的臆想，要求以占领满洲为其一系列侵略行动的起点，这决定了军队不可能支持对中亲善的外交策略。但是1933年6月到1935年6月的两年间，日军虽然有侵略的构思和意图，却是没有采取实际的武力行动，这对维持日本外务省和国民政府的亲善外交在客观上提供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应该认识到军部侵略的本质没有改变，这一段时间也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到1937年日本就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为巩固侵略满洲的成果而暂时中止了和国民政府的武力冲突。虽然关内处于停战状态，但是在关外，反满抗日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1934年9月陆军省的文件《满洲事变爆发满三年》中就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皇军东奔西跑，实属席不暇暖，迄今只讨匪次数，大小合计已达一千数百次，大部队之讨匪作战也有二十余次……”[2] P227—228次年的《满洲事变爆发满四年·满洲国概观》中提到：“治安工作大有进步，建国之际的三十余万土匪已减至二万余……为了维持治安，必须军队与武装警察之力，如今依然未出治安第一主义之时代。”[2] P227—228 1936年的《满洲事变爆发满五年》也提到：“土匪逐年加深共产思想只影响，其行动愈益恶劣顽固，……以期根绝匪祸，乃绝非轻易之事……因此亦有大量之牺牲，自事变爆发以来至今年7月底止，我在满各部队即有战死者（含受伤后死）2891人，病死者1037人，受伤者6694人，自昭和7年3月至今年2月的4年间，满军也战死1757人，受伤1878人。”[2] P227—228以上的记载说明虽然关东军占领了满洲，但是满洲境内的游击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斗争依然在进行着，大大消耗了关东军和伪军的精力，增加了其占领成本。也可以说，正是这些解放斗争成了日军继续侵略的羁绊，迫使日本不得不暂时停止向关内的进犯。

满洲事变是日军侵略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日本征服满洲的策略是“一个时期走一步，中间稍歇一下，以巩固成果，然后一见前面的障碍能用外交或武力扫除，便又走下一步”。[3] P154但就是这“稍歇一下”，为外务省开展“和谐外交”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使国民政府从军事压力下暂时解放出来，使国民政府发展经济，扩充军备，为即将到来的日本全面侵华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有了一定的军事准备。

三、国民政府开展对日妥协外交

在这一段时间的中日缓和外交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摆出了非常积极的姿态，使得中日关系缓和有了实现的可能。1934年夏，中日完成了关税修改。在《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处理工作中，在通车通邮问题上，尤其是在通邮问题上，中国方面最终妥协，接受了关东军的方案，1935年1月10日起开始通邮。早在1934年时，汪精卫就向有吉明提出将日中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1935年王宠惠访日时再次提出了公使馆升级的建议，同时国民政府取缔了反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如此，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和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

涉”完全放弃了，转变成亲日的外交政策。

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是有诸多原因的，首先是中国经济的急剧衰退，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极力避免与日军的武力冲突。1934年由于第五次“剿匪”军费消耗庞大，中国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到了1935年初，蒋介石已无力承担类似长城抗战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了。另外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沿海地区，给中国农村带来相当大的破坏，如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购买力减低，农村负债增加，背井离乡者增加，这些现象持续了数年。

1934年，中国遭遇六十年不遇的旱灾，受灾最为严重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直接经济损失达四万亿元以上，还有水灾，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当时的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也造成中国白银外流，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 [4] P192-195

其次是国民时府战争准备不足。中国的政局是分裂的，虽然蒋介石倚靠军事独裁，但是国内军阀派系林立，难以统一政局，对内“剿匪”尚未完成，对外日本的威胁日益加重。1935年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刚刚起步，难以对抗对中国早有侵略准备的日本，因此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越久越有利于自己。但是应该看到，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并不是单纯的妥协，而是在妥协掩护下的积极迎战准备。1934年由蒋介石授意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除了阐述中日和解的必要性外，也含有对日本的警告，告诫日本控制中国是不可能的，要日本认识到不要走到和中国同归于尽的地步上。同时，蒋介石也加快了同德国的军事合作，将主要的工业向西南转移，这都说明了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明确认识和准备，也证明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是绵里藏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的加剧，中国民族主义热情极度膨胀，对蒋的对日绥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阻力，也不利于蒋加强民族的凝聚性，但是对其政策，应结合时局，看到其正面意义。

四、结语

1933—1935年间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活动于其中的日本外务省、军部虽然有分歧，但是侵华的目的性却是一致的。国民政府实施对日妥协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应该看到其对日缓和政策含有对抗日本侵略的一面。这对于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都有其有利的一面，日本试图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同时又利用缓和的契机打压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离间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利于其侵略的目的。在这段缓和的过程中，日本得以巩固其在满洲的军事胜利的成果。对于中国而言，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加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以后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军事上的准备。但对日妥协违反民意，给国民政府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这三条线索，我们可以对这段时期的中日改善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一卷，第一分册.
- [2]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3] 格鲁.使日十年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4]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杜欣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来源：《考试周刊》2009年第52期 编辑：李光文）

